

視剖人埃及蘇

克勞司·梅納特著

(供內部參考)



蘇維埃人剖視

克勞司·梅納特著

北京編譯社譯

(供內部參考)

Klaus Mehnert
THE ANATOMY
OF
SOVIET MAN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Maurice Rosenbaum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根据英国倫敦魏敦菲尔德与尼科尔逊出版有限公司
1961年英文版譯出。原著以德文出版。原著名称
Der Sowjetmensch, 1958年德意志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供內部參考 •

蘇維埃人剖視

[西德] 克勞司·梅納特著

北京編譯社譯

*

世界知識出版社資料室編印

(北京后圓恩寺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10 · 字數 236,000
1964年3月第一版 1964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統一書號 3003·707 定價(五) 1.40元

目 录

序

第一章 所能看到的和不能看到的.....	5
第二章 社会结构.....	21

私 人 生 活

第三章 俄罗斯性格.....	28
第四章 家庭.....	46

物 质 世 界

第五章 繁荣.....	66
第六章 财产.....	77
第七章 成功.....	84
第八章 平等何在?	104

不是单靠面包

第九章 求知.....	118
第十章 一个尚待探索的世界.....	138
第十一章 思想自由.....	157

个 人 与 国 家

第十二章 集体.....	179
--------------	-----

第十三章	难道“他們”真的懂嗎？	190
第十四章	祖国	204
第十五章	滿意的和不滿意的	213
第十六章	逃避政治	227
第十七章	要求个人安全	238
第十八章	危机和反响	247
第十九章	批評——方法和目标	266
第二十章	外部世界	280
第二十一章	苏維埃人与西方	290
注釋		300

序

苏联的煤、鋼和原子发电的生产数字，集体化农业对苏联經濟的貢獻，苏联空軍的飞机架数——这些資料同下面这个中心問題相比是次要的：所有这些活动将来还会由布尔什維克控制呢，还是和我們一样的人将会起来当家？

目前，俄国的絕大部分政策掌握在那些在十月革命中起过作用并經多年的考驗证明是布尔什維克的人們手中。但是，总有一天，十月革命一代的子孙們将不再执掌政权；控制权将会轉移到他們的后代手中。那么，这些后代又将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难道我們的子孙还必须同斯大林之流以及赫魯曉夫之流这些狂热地坚持革命的分子打交道嗎？这种革命以一个龐大的、螻蛄般的机器人社会来威胁世界的其他部分。难道苏联人民經过共产党的教育和管束，已經改变成另一种人了吗？或者，随着 1917 年革命的越来越成为往事，他們的生活方式和他們的目标开始带有我們的色彩了嗎？难道說，人的因素終將战胜政治？簡而言之，苏維埃人究竟是“苏維埃化”了，还是“人化”了？

有些人說，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苏維埃人”，苏联人也就是俄国人，布尔什維主义只不过是俄罗斯性格的邏輯上的演变而已。持另一面极端說法的是苏联的領導人和意識形态的专家們，他們爭論說，“苏維埃人”是存在的，这是一种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人。

通过俄罗斯文学，我們大家对十九世紀的傳統的俄国人是熟悉的。本书現在试图确定俄国人旧有的特性在过去四十年期間究竟有那些已然消失，什么新的特征出現了，还有在这一失一現的双

重进程中所产生的后果又是什么。

从1929年以来，我在前后三十年間的十三次訪問过程中，总共在苏联度过大約六个年头，漫游过这个国家的全境。作为一个生长在莫斯科的德国人，我对这个国家的語言和习俗的自然而然的熟悉，給了我很大的帮助。但是，一个观察家所得出的結論，不仅仅取决于他所旅行过的次数和他对語言的熟练；也許，更重要的还是他对他的工作所持的态度。就我來說，这种态度可以概括地說是客观的，但却不是中立的。

一个人所能保持的客观程度显然是有局限的，但是，我試圖在这种局限以內尽可能地做到客观，要看到事物的真相，并且避免入为主。至于保持中立，我不能。我反对苏联企图硬把俄国人、中国人、南斯拉夫人、阿拉伯人、德国人以及其他入納入一个意識形态的模子里。我同样反对階級斗爭的概念，这种概念事实上正被用来掩飾苏联国内一个新的特权集团的出現。我非常痛恨那种以純粹无神論的精神，把人当作物质去完成朝着一个空想目标前进的极权計劃的做法。三百多万人从德国的苏占区逃亡西方，匈牙利和柏林为了爭取自由而进行斗爭；不需要这些事实就可使我深信，共产党政权所取得的胜利对于曾經享受过自由的那些国家來說，将是不可容忍的。因此，我坚决反对把布尔什維主义說成是一种政治哲学，坚决反对它的把共产主义强加在我国人民头上的努力。

正是由于这种态度，我才更加力求以客观的态度来写作。我曾有意識地避免发表极端的意見。我既不打算用紅色的妖魔鬼怪来吓唬讀者，也不打算用柔和的催眠曲来哄騙他們。我的这本书是为成年的讀者而写的，也包括年青的一代，我知道他們是完全能够理解政治的基本原理的。我特別希望能有一些年青的讀者。他們将来必須和苏联各族人民共同生存下去，他們将来还必须和他們

一道找出某种生存的办法。我希望这本书能在这方面起到一些作用。

引用斯大林的说法在苏联已经不时兴了，但是我想起了他在德国最悲惨的时刻说过的一句话；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说道：“希特勒之流来了又走了，但是德国人民却永远存在”。我把这句赞语回敬给那些容许斯大林统治他们这么久的人们。苏联的人民永远存在，而斯大林之流来了又走了。而且，不仅仅是斯大林之流。

我要向全世界许许多多的俄国问题专家和苏联问题专家表示感谢。由于他们人数太多，不能在此一一提及。但在本书书末的注解中提到了其中的一些人。今天，这些专家已经形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他们又可细分为许多流派而且各有其研究的范围。我愿把他们比作是种种高度专业化的医学研究人员——如眼科学家、心脏学家、皮肤学家、神经学家，等等；由于他们非常熟悉细微末节的东西并且使用非常现代化的方法，因此，他们在使我们了解人的情况上，作出了很大贡献。至于我自己，我倒很像是一个家庭医师；家庭医师虽然密切地注视着这些专家们的研究成果，但他却不从属于他们之中的任一学科，而他所作的诊断却是根据他对他的病人以及他们的背景所具有的毕生的而又亲切的了解而来的。

当我偶然从苏联官方的报刊上读到对于本书的一些批评意见时，我却不知道普通的苏联人对于此书看法如何——如果他们能有机会读到这本书的话。对于这个问题，我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不久前，我在我的邮件中发现一封信，用的是某个德国大学的信笺，署名的是一位知名的教授。他写道，在他最近访问莫斯科期间，有一次当他和一位德国同事沿着红场漫步时，一个年青的俄国人走近了他。这个陌生人听到他们说德国话，就打听他们是否来

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他們点了点头以后，他就請求他們向他們的同胞克勞司·梅納特致意并将下面这番話轉達給他：

梅納特所著的《蘇維埃人》一書已在莫斯科出版，只印了一百冊，僅供黨的高級人士閱讀。這位俄國人還說，他自己從一位親友處借得一本，並且從頭至尾把它讀完。教授引用這位俄國人的原話說：“對於今日蘇聯情況的描述，再沒有比這本書更真實、更客觀的了。這本書道出了一片真情，因此我情不自禁地在每行字下面都划上了道道。凡是讀過這本書而且能夠獨立思考的人，以及我曾和他們談到這本書的人，意見都不約而同。”這兩位德國人問他，如果此書再版，他有沒有什麼修改意見。這位年青的俄國人想了一會兒，然後堅決地回答說：“我不希望改動一個字。”

克勞司·梅納特

1961年9月1日

于斯圖加特

第一章

所能看到的和不能看到的

喜欢怀疑的讀者也許要問：訪問一个在外国观察者的面前千方百計地掩飾自己的国家有什么用？即便是你懂得它的語言还不是一样！在这个国家里，一个外国人在一哩地以外就会被人认将出来，而且老远地就会被擋了駕，所以你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些“波将金的村庄”^{*}罢了。

但是，这并不完全正确。今天，一个外国人——至少，一个男人——在苏联已經是不像二十年以前那样引人注目了。俄国新的特权集团的衣着式样現在和我們的相仿佛了。妇女們的服装式样落后于西方，但是，馬賽、汉堡或者列宁格勒的衣冠楚楚的男人們，看起来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不同的只不过是西方人的衣裳的质料远远胜过俄国人的罢了。

1955年秋天，我走到莫斯科的一个法院門前。門廊里的一張布告上，写明了当天将要审問的案件。我看到有“第三庭，十点，流氓案”。我想，我可能从这个案件里了解一些有关苏联流氓的材料。十点钟，当我走进法庭的时候，出席的人寥寥无几。旁听席上坐着屈指可数的几位旁听者，一位書記員正在整理法官席。

-
- 波将金·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維奇(Потёмкин 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739—1791年)，系俄国陸軍元帥，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寵臣。在第二次俄土战争(1787—1791年)中曾任俄軍总司令。他在1783年使克里米亚并入俄国。傳說当1787年女皇叶卡捷琳娜訪問克里米亚时，波将金为了让女皇看到当地显得人口兴旺起見，就在沿途制造了一些假村庄，因此有“波将金的村庄”一詞。——譯者

当她看到我的时候，她說：“我想你是律師罷？”“不，”我回答說，“是个旁听者。”于是我就在旁听席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一面心想，我的外表在这位書記員的眼中看来一定像个苏联的律師了。

一年以后，在一个外州的市鎮里，我走过一个学校的門前，并且决定进去看看。我在門口遇到一位学生，这是一位大約十七岁的姑娘。“早上好，厂长同志，”她說。“會議在二楼开，要我給你帶路嗎？”

換句話說，我发现，一位中年的欧洲記者只要不把自己打扮得太显眼，他就可能像苏联(和过去的沙皇俄国)的社会中的“知識分子”阶层中的一員而通行无阻；关于这一部分人，以后我还要加以詳述。

1956年春天，在从莫斯科飞往西伯利亚的途中，我惊奇地发现我有着一件在苏联交朋友的得力工具。由于我知道道路上可能雪水遍地、泥濘不堪，因此我就穿上了一双坚固的滑雪靴。当我们离开莫斯科的伏努科夫机場时，天还没亮，因此我們在喀山着陆进早餐。我剛剛点完飯菜，一位陌生人就在我的桌边坐下。“同志，”他打着招呼說，“你穿的这双靴子真棒。可以让我瞧瞧嗎？”

他把这双靴子仔細地察看了一番——靴跟有凹槽，靴帶交叉着，还有厚厚的、带有花紋的橡胶底；于是我們就在一块儿进早餐。后来，他招呼他的一位朋友过来欣賞我的靴子，于是我們的桌子四周很快地就圍上了很大一群人。在我的旅途中这样的事接二連三地发生着。有个人非常欣賞我的这双靴子，他居然脱下他的鞋子和套鞋要同我交換，并且外加一支自来水笔和一磅苹果。幸好他的鞋子尺寸比我的大得多，否則这件事就很难加以拒絕了。

在斯大林时代，一位苏联公民如果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位外国人时，就会变得緊張而且拘謹的。他唯恐一言不慎，甚至是一句話被人誤解，就会有人向国家保安机关报告，因而很可能招来令人极

端不愉快的后果。在那些日子里，我经常碰到人们的这种态度，下面这件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35年夏天，火车总是拥挤不堪，要在小站上上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时我从北极归来，我打算在维亚特卡（现称基洛夫城）搭上开往莫斯科的特别快车。但是，在我跳上车去的时候，火车已经开出站外几百码了。过了一会以后，有位医生从车厢的走廊经过，他问是否有人需要他的帮助。“是的，我要！”一位蜷曲在车室的行李架上的姑娘喊道。我当时正站在这个车室的外面。她说，“赶快给我点药吃。”她用她们国家所特有的那种落落大方的态度大声地说出哪儿不舒服。

“喝点蓖麻油，”医生一面说，一面狠狠地倒了许许多多。姑娘从她蜷伏的高处爬了下来，开了开药水，做了一个鬼脸。我替她感到难过，劝她把那药水扔了，同时给了她两颗药到病除的药丸。她咽下了药丸，对我非常感激，因而邀请我同她和她的朋友们坐在一起。她说：“我得告诉他们我们彼此认识，而且在大学里同过学。”

以后的几个小时过得非常愉快。我们大家把车室的三层铺位全都挤得满满的——这群姑娘是前往克里米亚的一个学生矿泉疗养地去的，几个年青小伙子是在火车上加入她们一起的，另外还有我。我们一块儿唱歌，说笑，搞点文字游戏，火车在每个站上停下时，大家轮流挤下车去弄些开水来沏茶。后来，有位姑娘叫丽达，她注意到我的左手小指上戴着一只戒指。她从来没见过男人戴戒指，因此这就引起了她的好奇心。于是一场热烈的讨论开始了。我的那位要喝蓖麻油的朋友伊林娜用一种武断的语气结束这场辩论说：“如果说这位同志是位专家，那完全正确；但是，如果说他是个干手工活的，这简直是说蠢话。”

大家都认为这种说法是合乎情理的，我也承认我是一位专家。

然而，丽达并不以此为滿足，当談話稍为停頓時，她提議我們大家全都談談自己的身世和工作，以便消磨時間。中学，干一門手艺，上大学，参加共青团，在工厂里工作——这些就是他們的身世，然后就輪到我了。

“我不想告訴你們我是干什么的，”我說。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当然得告訴我們。为什么不告訴我們？”

“如果我告訴你們，你們大家都会跑开的。”

“廢話！”姑娘們說，她們庄严地保证她們决不会这样干。而且無論如何，正如丽达所指出的，“即使我們想要这样做，我們也做不到。”

“那么，好吧，”我說，“我是一个德国記者。”

頓時呈現出一片死寂，只有車輪的声音在隆隆地响个不停。我的旅伴們的臉由于惊愕而木呆了。过了几秒钟以后，他們露出了显然是不相信的神色，仿佛他們是在談話之中突然断了思路一样。然后，他們彼此偷偷地瞧了一眼，接着一位姑娘便吃吃地笑了起来。“你在开玩笑，”她說。在他們看来，“德国人”就意味着“法西斯分子”，而“記者”也就是“間諜”的同义語。这两样之中有一样就已經是够糟的了；两样凑在一起就不禁使得她們毛发竦然了。

伊林娜的臉紅了。因为是她把我介紹給他們的；更坏的是，她还說过我們曾經同过学。

“是的，”我又說了一遍，“我是一个德国記者。”于是我从口袋里掏出我的身份证来让大家傳閱。

这个身份证的本身，苏联外交人民委員的印鉴，我的相片，还有我的签字都經過了仔細的察看。就在这个时候，火車在一个站上停了下来。我們的車廂外面有一些农村妇女在卖鸡蛋、嫩黃瓜、牛奶和烤小鸡，于是我們大家全都挤出去买东西。當我們回到座位上时，每个人都表現出很友好，但都有点拘謹。我的旅伴們的好

奇心已經不翼而飛了。她們絲毫也沒有問到關於德國的問題。

這種態度是很容易理解的。根據 1926 年蘇俄刑法典中的臭名昭彰的第五十八條規定，把沒有公布的經濟情報供給外國人是一種刑事罪，而且這條法律現在已經變得更加嚴厲。^① 如果洩漏下列的國家機密就會構成應受懲罰的犯罪行為，這些機密包括：工業生產數字和關於國內與對外貿易、運輸系統、財政、專利品和礦業資源的情報。在三十年代里，也許在以後，許多俄國人被判長期徒刑不是由於他們曾經向外國人洩漏了這些所謂的“機密”，而是因為他們曾經同外國人接觸過而又不能證明——他們又怎麼能夠證明呢？——他們沒有向外國人洩漏過機密。

大戰以後過了兩、三年，我收到一封蓋着法蘭克福的郵戳的信，寫信的是我不認識的一個俄國人。他說，他在一家德國報紙上碰巧看到我的名字，問我在三十年代早期是否在莫斯科，如果在的話，又是否曾經參觀過由一個半軍事性組織“蘇聯國防航空化學建設促進會”主辦的一次步槍射擊比賽。我回信說我參觀過。

幾天以後，一位年青的俄國人訪問我，我記得十五年前我曾見過他，當時我得到官方的許可，正在研究“蘇聯國防航空化學建設促進會”這個組織。一個星期天，我曾去參觀他們在莫斯科附近一個步槍射擊場舉行的射擊比賽。訪問我的這個人——姑且稱他為彼得羅夫——曾經是參加競賽的一個隊的隊長。以下就是他告訴我的話：

“在那幾年里，外國人時常來觀看我們的步槍射擊比賽。有一天，他們當中有些人請我在賽後同他們一塊吃飯。他們沒有問過我任何不應該問的問題，我也沒有自動向他們提供任何種類的情報。但是在 1937 年，我在半夜裡被捕了，並被流放到北極的一個勞改營，罪名是洩漏國家機密。沒有給我任何辯護的機會。說實在的，我當時感到給我留下這條命就是够幸運的了。當戰爭爆發時，我

从劳改营里被釋放出来，获得了赦免，并被編入了軍隊。在头一次战役中，我就逃到德国人这边。”

我問彼得罗夫在他被捕以前是不是一个反共分子。他搖了搖頭。

“当你来观看我們的步枪射击比賽时，”他說，“我大約才十七八岁。我是一个共青团員，而且从来没有到过苏联境外。对我来说，斯大林是个偉大的領袖。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向外国人泄漏一点国家机密，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过同一个外国人談論任何复杂的政治問題。但是，几年以后，我心里开始起了疑团；这里、那里、到处捕人，那些我深信他們是正直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忠誠可靠的人們，却突然无影无踪地消失了。后来，当他們抓住我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逃往国外。”

斯大林死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那种在斯大林恐怖統治时期每当人們碰到一个外国人时所具有的恐怖感减少了。下面这件事可以說明我的意思。

1955年秋天，我决定去观看索弗罗諾夫的話剧《心不能原諒》。話剧是八点半鐘开始，但我到九点半鐘第一次休息时才赶到剧院。当我找到我的座位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三十岁左右的俄国女人問我怎么还会想起要来剧院，因为我已經錯过了戏剧的一半了。

“請不要責备我，”我說，“最好还是請你給我簡單讲讲已經演过的剧情，使我能够看懂下面的戏。”

“剧中的中心人物，”她說，“是叶卡捷琳娜，她是集体农庄的一位热心的檢查員。她的丈夫斯捷潘是一个懶汉，她不但因此看不起他，而且对他没有一点爱情。同时她却越来越傾心于附近一个国营农場的精明能干而又襟怀磊落的場长。”

“換句話說，就是鬧三角关系。”

“是的，三角关系。不过；有一边——斯捷潘这边——很快就

撒手了。当三角关系中的一角不存在时，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呢？是一条直线，是两点间的直接联系。后事如何，咱们且看剧中分晓吧！”

“非常感謝，”我說。“我感到我仿佛是从头看起的一样。”

“可是你还没有告訴我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她說。

“我有一个正当的借口，”我回答說，“我上克里姆林宮去了——我是一个記者。”

“哪家報紙的？”

“我替好几家德国報紙和德国电台工作——我是德国人。”

“多么有意思！东德还是西德？”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

“这就更加有意思了！再告訴我点什么。”

正当这时，剧院里的灯光暗了下来，幕布揭开了。在最后一幕里，叶卡捷琳娜和她的丈夫之間起了一场激烈的爭吵。她非常明白地表示，她和他之間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她再也不把他当作一个丈夫了。“心不能原諒”，她喊道。但是斯捷潘不相信他的懶惰是唯一的根源，他猜想他有一个情敌。他怀疑附近的国营农場的場长，他决定要杀死这个場长。但是在千鈞一发的时刻，叶卡捷琳娜把他手里的武器打掉了。

这是一个迷人的夜晚，看完剧以后我們朝着莫斯科的中心漫步走去。我們一致认为，这个剧的内容很貧乏，我的这位新相識特別不滿意那个过份緊張的結尾，这个結尾和剧中的其他情节从邏輯上沒法联在一起。

那么，我問她为什么挑中这个剧来看呢？她回答說，她并不住在莫斯科，而是随手买了这么一張票。她还說，她在写詩。我請她朗誦几首給我听；于是在这个溫柔的莫斯科夜晚里，伴随着我們的脚步声，她背誦了一首情詩，这首詩的每一节的結尾都是这两句：

“我爱的是你，你却爱上了别人”。

“又是一个三角关系！”我说，于是我们两个人都大笑起来。然后她要求我告诉她一些关于德国的情况，特别是关于戏剧和文学杂志方面的情况。我们终于走到了她旅居的住所，于是我向她道了晚安。

她这种毫无顾虑的态度，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是现在，苏联的公民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因此他们还是不愿同外国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而且不愿到他们所住的旅馆去访问他们或在邀请他们到家里来作客。只有在外交人员、记者、艺术家和文学家当中可以找到例外；赋予他们的这种同外国人交往的特权乃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也许甚至是他们任务中的一个部分。

近来，气氛又变得含有敌意的了。同外国人来往的俄国人又被警察盘问了。结果，在莫斯科的外交官员和记者们经常抱怨说，要和个别的俄国人士或俄国人的家庭建立任何正常的社交关系简直是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收获的谈话就是同那些偶然相识的人们的交谈。在火车车厢里、餐车里或者旅馆里，人们谈起话来比较随便。这种偶然进行的、为时不久的、不是由他们开头的，而且将来不会再来一遍的谈话，他们现在不大害怕或者完全不怕有朝一日会被用来当做控诉他们的证据了。

苏联公民对外国人感到强烈的兴趣。他们通常询问陌生人的头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哪国人？”在俄国人看来，一个英国人和一个法国人之间的差别不如一个真正的外国人和一个可以称之为半外国人之间的差别来得重要。一个真正的外国人是来自铁幕的另一边的人；一个来自波兰或者罗马尼亚的人仅仅是一个半外国人，因为他生活在同苏联一样的政权下。来自铁幕国家的客人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事可说。他们必须小心谨慎，往往是俄国人告诉他